



# 孤忠大节 文天祥

GUZHONG

DAJIE

WENTIANXIANG

● 郝连昌 / 著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第一章 “一介寒微” 独占鳌头

携一缕赣南竹风，他朝我们走来，一个摘取  
状元桂冠、踌躇满志的莘莘学子。然而，他生不  
逢时，边事日急，紫禁城里花天酒地。文天祥，  
将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坐标呢？

南宋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宝祐四年（1256年）五月，  
举子们翘首以盼的殿试唱名之日在即。

临安位于钱塘江入海口，早在北宋初年，就是个经济比较  
发达的城市。建炎三年（1129年）兀术南侵，高宗赵构仓皇渡  
江，三年后，即绍兴二年（1132年）金兵北撤，南宋遂定都于  
此。至理宗朝，临安经过一百余年的建设，已发展成为江南的  
大都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区居民十几万户，人口  
40余万，相当于宋初一倍。如今，绿瓦红墙，宫殿巍峨，长街  
通衢、里巷遍布城区，商号林立，市声嘈杂，偏安一隅的南宋王  
朝，京城里呈现一片虚假的繁荣。

正月以来，各州府的贡士云集京城，科考成了人们街谈巷  
议的话题。

科举取士始于隋，此后，成为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惟一途  
径，惟其如此，备受全社会的关注。学子苦读多年，一朝中了

进士，便取得跻身仕途，“为民父母”的资格，不啻是抬高身价、光宗耀祖的盛事。

二月一日礼部会试，及格者于五月八日参加了殿试。这是由皇帝在集英殿主持的最高级考试，中榜者即为进士，又称“天子门生”。

五月二十四日对举子们来说，是个神圣的日子：公布新科进士名次，理宗亲临唱名仪式。这一天，主考官王应麟等率先携试卷来到集英殿，恭候御笔钦点鼎甲前三名。参加殿试的举子们齐集于殿门外，虽然万头攒动，但无喧哗之声，气氛异常严肃庄重。

朝霞映红集英殿的飞檐，滚龙旗杆上的旗幡在晨风中飘舞，御林军持戈守卫。寅时许，钟鼓齐鸣，笙箫合奏，身着衮冕的理宗皇帝在文官、内侍的簇拥之下款步登上正殿台阶，走进殿内，在龙案前坐定，身旁龙凤宝灯通明透亮，紫金炉里燃着檀香，香烟缭绕。备选试卷已由考官批阅定等，依次排列。理宗一份份地翻阅试卷，当他揭开第五本试卷时，眼睛顿时一亮，此卷字迹遒劲、飘逸，洋溢着阳刚之气；其文气势磅礴、汪洋恣肆，如江河直泻千里，不禁佳许道：“切至之论！”他询问王应麟此卷出自何人之手，王应麟揭开卷头密封，禀奏道：“此人乃庐陵文天祥也。”理宗欣然命笔，在试卷上写下“进士第一”四字。

殿外，举子们怀着急切的心情等待着，一束束紧张和期盼的目光集中于殿门之前，这时，殿门开了，人群活跃起来，向着前方涌动。唱名官走到殿前，依次高声朗读新科进士的名字。有人听到自己的名字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轻声喊出：“中了！我中了！”有人兴奋得淌下热泪。当然，也有的怀着失望和沮丧，默默地走开了。人群中，有一个身着棉布长衫、面庞略嫌清瘦的高个子青年，当他听到一甲第一，即独占鳌头的状

元竟是自己时，眼睛里闪现出瞬间的喜悦，但很快又恢复了平日的沉静。他离开人群，时而低头踱步，时而驻足凝神，眉头微锁，似乎一种无形的重负压上了肩头。这位青年就是来自赣南山村的文天祥。

天祥出生在赣南吉州（今江西吉安）庐陵县淳化乡富田村。富田坐落在庐陵东南不足百里的半山区。它的周围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可耕地不多，大都在坡边谷底，且地力不肥，富田人自然也就与“富”无缘。给富田取名时，人们大约只是用“富田”寄托美好的愿望而已。然而，富田却是一个美丽的山村，村前碧水如带，村后的文山，像一道屏障护卫着这几十户人家，山坡平缓，林木蓊郁，泉溪低唱，和着鸟鸣，越发显得山村幽静。

富田文家的世系，正史并无记载，据天祥所作《先君子革斋先生事实》称：其祖籍四川成都，何时徙居吉州，不得而知，只说：“五世祖炳然居永和镇，高祖正中由永和徙富田。”天祥高祖利民，曾祖安世，祖时用，父仪，字士表，号革斋。母曾氏，本县泰和乡曾珏之女。曾珏不曾参加生产劳动，以读书为乐，大约晚年无依，天祥接至家中赡养。文、曾两家，可谓门当户对，皆非豪门大族，但都以诗书继世。文家祖上未见科举登第者，天祥自称“一介寒微”，可能是个小有名望的破落地主。文仪二十二岁生天祥，次年生次子璧，三子霆孙早卒，三十九岁生四子璋，另有三个女儿。

文仪平生爱好有二。一是喜竹。喜竹之挺拔有节，傲雪凌霜。他在庭前植下丛丛翠竹，读书、用餐，每以翠竹相伴，偶尔兴之所至，便以竹为题，吟诗一二首。他的书斋也以竹为名，号曰“竹居”。二是爱书。文仪家境并不宽裕，即使有些积蓄，也不治田土，不广宅院，只是一味地买书。他的书斋俨然是个书的世界。一函函，一册册，重重叠叠，摆放得整整齐齐。

有关文仪爱书的趣事，村里流传着不少佳话。据说：有一次他去吉州，办完事，照例到书肆浏览一番，无意中发现一帙新书，如获至宝，可是一摸衣兜，钱不够了，想次日来购，又担心被别人买去，他犹豫片刻，毅然去当铺当掉长衫，才把书买到手。进了家门，夫人见长衫不翼而飞，愕然问道：“长衫遗在何处？”他指了指怀中书，喜滋滋答道：“在此，在此。”夫人先是不解，遂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会心地笑了。

买书是为了读书，文仪每天用罢晚餐，径直走进书斋，亮起孤灯，如醉如痴地读起来，常常通宵达旦，晨光熹微，仍无倦意。经史百家，文仪无不钻研，天文、地理及至医药等书，也多有涉猎。他精读过的书，多用朱笔圈点，时有新见，即作眉批，仅读书笔记就有百余卷。

然而文仪一生读书，却与功名利禄无缘。天祥说他读书是为了“闻道”，实际上，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登第为官的契机。因为在封建时代，实现抱负，施展才华，惟有科举一途。

天祥和二弟文璧只差一岁，身高相仿，犹如孪生，所不同的是：天祥性格刚强坚韧，而文璧文弱浮躁。为了培养二子成材，在他们刚刚懂事的时候，文仪便给他们延请塾师。乡里介绍几位，束脩低廉，但或因学问平平，或因师德有缺，文仪均未应允。他笃信名师出高徒，又托挚友请来曾凤执教。曾凤精通儒典，口碑颇佳，是一位饱学之士，后来曾任衢州教授，掌一州邑校课试，进而擢为国子监丞，在京城任职多年。天祥兄弟在曾凤教导下，学问上获益匪浅，做人上也受到良好影响。后来，天祥在其著作中，对曾凤给予充分的评价。

然而，文仪终因家道中落，生计拮据而辞退塾师，由他自己亲授。他对天祥兄弟要求十分严格，白天讲授新课，晚间要他们须背诵当日所学，凡遇名言警句，令他们写成字条，贴在

墙壁上。天祥兄弟有时正襟危坐，琅琅诵读；有时走笔疾书，各抒心得。天祥在课余时间最爱读忠臣烈士传记，后来在大都（今北京）土牢囚禁期间，他回忆起少年时代生活时，还说：“儿时爱读忠臣传。”文仪教导天祥兄弟，读书重在理解。他常提出问题让他们回答，要求他们融会贯通，加深领会其中义理。有时，在月明风清、竹影婆娑的夜晚，父子三人坐在庭院里，谈古论今，以古鉴今，气氛颇为活跃。文仪曾谈起：春秋时期的齐国贤相晏婴具有杰出的才能，多次出使列国，为齐国的强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是，他平时出行敝车羸马、简装约从。文仪联系当朝官场腐败、奢侈之风，告诫天祥兄弟要为国效力，不慕虚荣。

宝祐二年（1254年），在天祥十八岁的时候，他和文壁告别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富田村，来到庐陵邑校读书。这时，北方蒙古大军压境，呈剑拔弩张之势，南宋王朝受到严重威胁。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胁往往来自北方而不是南方。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次推进到黄河流域，建立地方性政权，甚而入主中原。诸如与东晋并存的十六国；北宋时期的辽、西夏、金等。其实，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地域多是平坦、宽阔的大沙漠、大草原、大平原，气候酷冷、干燥。他们的生产方式又长期滞留于狩猎和游牧，善骑射。所有这些北方独具的自然和人文条件，赋予了他们粗犷、豪放、勇猛和富于挑战的民族性格。13世纪初崛起于大草原的蒙古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小视的民族。

蒙古各部落间经过长期征战和融合，于1206年完成了统一，铁木真被推举为大汗，人们尊称他为成吉思（强大之意）汗。五指一旦攥成了拳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便凭借强大的骑兵和富于挑战的民族心理，在贵族统治集团的唆使下，发动了大规模的非正义战争。一时间，蒙古草原成了欧亚大陆的

战争策源地。其兵锋所指，财物被劫掠一空，人民惨遭涂炭。几十年间，先后攻灭上百个部落和国家。其征服地域之广历史上实属罕见：东至朝鲜半岛；西至中亚和伊朗大部；北至西伯利亚、南高加索；南至黄河流域。

蒙古统治集团进攻的重点是宋金统治区。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遵照其“假道于宋，宋金世仇”的遗嘱，于1235年与宋联合，一举攻灭了金。从此，蒙宋之间的隔离带不复存在，正面冲突已不可避免，蒙宋长达四十余年的战争开始了。

1251年（淳祐十一年）蒙哥汗继位后，在邓州（今河南邓县）至亳州（今安徽亳县）一线，屯驻大军，摆开大举南犯的态势。

正在邑校读书的天祥血气方刚，心理上、思想上已进入成熟期，他开始用理性思考人生了。而江上有警，边事日急，使他倍加关心社稷安危。茶余饭后，他同学友经常谈论的多是人生、理想及富国强兵、抵御外辱等话题。

一天傍晚，天祥和几位同窗漫步于赣水之滨，文璧也在其中。水波奔涌，泛着落日的余晖，船篷上升腾着袅袅炊烟。天祥在岸边的一片竹林停下脚步，文璧和学友们也都不约而同地跟了过来。天祥凝望翠竹，慨然道：“壮哉，翠竹！虚心且有节，直立于天地间。”学友们点头称是。

这时，文璧俯身拾起一片柳叶，端详了片刻，说道：“万木皆有所长，柳则生不择地，江南亦可，江北亦可，随遇而安！”

天祥抬眼眺望沐浴着晚霞的青山绿水，心情有些激动地说：“庐陵自古为名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大宋朝仁人志士出于庐陵者众矣！”

一位学友搭腔道：“欧阳（修）文忠公当首屈一指，其道德文章名闻天下，《醉翁亭记》乃传世之作。”

聪明颖悟而又性急的文璧，高声背诵起：“环滁皆山也。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五百余字文章，一气背完，博得一片掌声。

天祥说：“文忠公乃一代文豪，诗文革新之领袖，其犯颜直谏尤其令人敬佩。仁宗年间，范（仲淹）文正公行“庆历新政”，被朝中小人诬为结交朋党，滥施权威，于是离京远谪，朝官多为暗自同情，惟文忠公不避风险，上书仁宗，指陈过失，为范文正公鸣不平。”

一位学友道：“胡铨，亦庐陵人也。”

另一位年少的学友发问道：“胡铨何许人也？”

天祥耐心解释道：“胡铨，字邦衡，号淡庵，建炎二年进士，除枢密院编修官。当时奸相秦桧弄权，怂恿高宗杀害岳（飞）武穆，且同金签订丧权辱国之和约。胡公义愤填膺，上奏高宗，祈斩秦桧、孙近、王伦三贼臣，朝野为之震动，戮力抗金呼声日高。然此举却为高宗、秦桧所疾恨，竟贬胡公于穷乡僻壤达二十余年。”说到这里，天祥满怀激愤，脸色涨红，平静了片刻，又说道：“杨邦乂公，诸君可得闻乎？杨公官位不高，然其气节感人至深。高宗时，杨公任建康（今江苏南京）通判。金兵南犯，攻入建康后，杨公被俘，兀术软硬兼施，令其降金。杨公血流满面，高声叫骂。撕下衣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宁做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兀术诱之以高官显位，杨公无动于衷；兀术以赐死相威胁，杨公面无惧色。终以头撞柱基而就义。何等壮烈也！”

学友们听了天祥的讲述，被杨邦乂的英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更为生在庐陵感到自豪。他们边谈边走，不知不觉来到邑校门口，天祥说：“诸多乡贤，后世楷模，我辈当自勉上进！”他建议：明日去吉州学宫瞻仰乡贤遗像，大家一致赞同。

次日，天祥同学友结伴而行，来到吉州学宫。所谓学宫，大都建有文庙，即是说，学宫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学舍，一

部分是文庙。建文庙是为了师生便于祭祀孔子。到了宋末，由于战乱频仍，书院势盛，许多州县的学宫学舍废弃，文庙独存。吉州学宫就属这种情况。天祥一行进了学宫，但见古木参天，荷香扑鼻，穿过红枫掩映的青石甬道，绕过天井，从穿堂走上宽敞明亮的正堂。他们先向孔子像行了稽首大礼，绕到正堂靠后门处，便是乡贤遗像了，像下分别陈列着乡贤遗物和著作。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行了拜礼，便默默地走开，去后院参观了。只有天祥肃立于像前，久久没有离去，他心潮起伏，激动万分，含着热泪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莫不俎豆其间，非夫也！”<sup>①</sup>意即干一番宏伟事业，为后人纪念，否则就不是大丈夫！此后天祥的壮举，证明这句话决非轻易出口，而是他终生实践的誓言。

天祥在邑校学习时间不长，就以考试第一的成绩升入吉州白鹭洲书院。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代。唐玄宗开元中置丽正殿书院，十三年(725年)改名为集贤殿书院，但这是设于朝省的藏书和修书机构，而作为讲学授徒、培养人才的书院，则始于南唐昇元四年(940年)建立的白鹿洞学馆。书院在宋代，官立者固多，私立者尤众。它是封建社会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学者个人讲学，自由阐发观点。生徒以研习儒典为主，学习方法灵活，有个人攻读、集中讲解、质疑问难等，形成了书院特有学风。

白鹭洲书院是江万里于淳祐元年(1241年)创建的。江万里是著名学者，当时知吉州，他重视教育，热心于人才培养，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款在吉州城东白鹭洲上建起书院。白鹭洲是赣水上的一片绿洲，四面碧水环绕，茂林修竹，

<sup>①</sup> 《宋史》卷四百十八。

芳草萋萋,亭台楼阁,曲径回廊,环境十分优雅,是学子读书的好所在。书院创建之初,江万里未能找到合适的人任山长(即院长),由他自己亲授生徒。到了天祥入书院学习时,正值欧阳守道任山长。他也是吉州人,幼年孤贫,自学成才,乡里人聘以为师。他在吉州考取贡士后,于淳祐六年(1246年)中进士,先后在零都、赣州做了几年小官,便应聘到白鹭洲书院任山长。他是江万里的亲传弟子,故天祥在其著作中称自己是江万里的再传弟子。

天祥从出生到考取进士,在其生命历程中可算是一个段落。这段岁月中,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时期。他的家庭并非世家大族,但有着良好的传统教育。其祖世用知书达礼,世有积德,乡里人十分尊重他。父文仪“嗜书如飴”。天祥从幼年就受到子曰诗云的熏陶,儒家思想使他树立了尚忠孝、重气节的信念。而富田瘠薄的土地,较为贫困的家境,又磨砺了他肯吃苦、不畏难、坚韧不拔的性格。家塾、邑校、书院犹如阶梯使他一步步登上了科举的巅峰。在十几年的家塾学习中,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史知识,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理学基础。尤其是白鹭洲书院,学术空气浓厚,学子思想活跃,对天祥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这里有名师指点,从山长欧阳守道的学历和经历考察,可知他不恋仕途,也不善为官,但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执教书院、课授弟子是其所长。他十分欣赏天祥的才学,天祥对他也备加敬重。在《祭欧阳巽斋先生》一文中,天祥说:“先生爱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执经。”欧阳守道平日同生徒攀谈,话不投机,怫然不乐,但只要见到天祥,一脸不快顿时消失。天祥与之探讨学问,情急之下争辩几句,他也毫不介意,一笑了之。天祥从欧阳守道等名师那里所受教益颇多。其次,书院建在州之治所,信息灵通,师生朝夕相处,于切磋学问之外,经常议论时政。朝廷腐败,社会黑暗,民生维艰,

都是他们议论的话题,使天祥开阔了眼界,增广了见闻。后来,他在洋洋万言的“御试策”中,痛揭时弊,力陈良策,当得益于此时。总之,这一时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为天祥此后的英雄壮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天祥在白鹭洲书院读书不足一年,宝祐三年(1255年)他和文壁中了贡士,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他们正要动身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三弟霆孙突患重病,当地医生救治无效,合家万分焦急,父亲吩咐道:“速赴泰和(今江西泰和县),延请名医!”文壁站在门口,望着落日,瑟缩着身子,自语道:“天色向晚,山路难行。”迟疑间,天祥已飞身上马,直奔泰和镇而去了。待三更刚过,医生迈进家门时,三弟已停止呼吸,永远地离开了他所挚爱的亲人。

年关在即,富田人赶集上店,备办年货,家家户户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惟独天祥一家沉浸在悲痛之中。母亲整日以泪洗面;父亲在怜伤三弟的同时,还牵挂他与文壁参加科举之事,从早到晚,愁眉紧锁,不思餐饮,后经天祥劝慰,他才决定同他们一道进京,一可排遣忧闷,二可一路照料他们的生活。

十二月十五日,父子三人从庐陵启程,取道信州(今江西上饶)、江山,第二年正月十五日,抵达京师临安。

天祥父子三人到达临安时,适逢元宵节。晚上,满城张灯结彩,歌楼酒肆彻夜灯火通明。舞女的清歌、游人的欢笑,荡漾在如诗如画的西子湖上。天祥目睹权贵们醉生梦死的享乐而无大敌压境之忧,他心急如焚,深切感到国家到了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候了。

天祥兄弟顺利通过礼部初试后,不巧,殿试前两天,天祥突患感冒,高烧不止,四肢无力,头晕目眩,但还是支撑着身体去应试了。他和学子们从侧门进入考场,一阵拥挤,使他出了

一身汗，病情反倒减轻，头脑也清醒了许多。在殿廊坐定后，展开题纸，细审了一遍考题。题目很长，计五百八十六字，提出如下几个问题要应试者各抒己见，即：天变与民生有何关系？你对人才与士气看法如何？你对兵力与国计有何见解？灭贼与御寇孰轻孰重？天祥审题完毕，连草稿也不打，一气答了下来。约至下午未时（二至三时）许，一篇万余字的有文采、有气势、见解独到、说理透辟的政论文章便写了出来。

在“御试策”中，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基本精神，首先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时期的混乱局面。宋代最高统治者认识到：五代时期三纲五常之道，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动摇了君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他们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论证封建制度和封建纲常的合理性和永久性，于是，理学应运而生。在宋代，它建立起自己巩固的权威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天祥生活在理学盛行的时代，而且是理学大家朱熹的三代弟子。他在“御试策”中反映出来的哲学和伦理学观点，是能够从理学思想府库中找到根据的。朱熹说：“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sup>①</sup> 天祥与之一脉相承，他在“御试策”中说：“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朱熹认为：“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sup>②</sup> 表现在人的伦理关系上，“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sup>③</sup> 天祥则说：“君臣父子安其伦，流行古今，纲纪造化，何莫非由斯道也。”足见天祥与朱熹在伦理学上的源流关系。

但是，在思想理论方面，天祥重师承而不固守师承。就是

① 朱熹：《朱子类语·戊申封事》。

② 朱熹：《朱文公集》卷七。

③ 朱熹：《语类》卷十三。

说,他从理学之外吸收了颇多的有益营养。如所周知,王安石、李觏、陈亮、叶适等思想家,同理学存在着分歧。他们同意理学的“尚德”,同时又主张“兴利”,而在“尚德”方面,他们又不同意重义轻利。就是说,他们强调道德的实际效益。天祥打破门户之见,大胆地吸收了这一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思想理论。他认识到:要维护封建秩序,挽救社会危机,仅靠整顿和强化封建道德是不够的,还要重视物质生产,大力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他提出最高学府国子监开设边防、水利科目等务实性很强的建议。

继而天祥把“御试策”中提出的社会问题概括为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即“臣闻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

一、关于“天变”,即天灾的不断发生,天祥说是“民怨”招来的。他把民怨同天灾联系起来,而且是因果关系,这显然是错误的。但应当肯定的是:在分析“民怨”产生原因时,他把笔锋直接指向统治集团对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指向他们腐朽糜烂的生活,则是一针见血,痛快淋漓的。他说:“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sup>①</sup>积于私贮,而民生困;自建章、通天<sup>②</sup>频于营建,而民生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生困;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生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为家鸡圈豕,唯所咀啖,而民生困。”天祥时而以古喻今,时而直面现实,揭露南宋“民困”的种种缘由言而有据。他了解国情,体恤民意,忧国忧民的情怀,由此可见一斑。自高宗南渡以来,南宋的皇帝们,并无亡羊补牢之志,励精图治、振兴邦国之心,而厚敛无度、大兴土木、扰民生计,则一代胜过一代。高宗在临安建都后,大造宫室,修葺御花园,营建御前甲库等达数十处。

① 都是唐代宗私贮贡物及珍宝之藏库。

② 即建章宫、通天台,皆为汉武帝建造。

江南能工巧匠汇集临安，日以继夜地施工，劳民伤财，耗资巨万。理宗朝，“时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内忧外患交加，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他却屡遣朝官到江南各地广搜良材嘉木，为闫贵妃修建功德院。功德院位于西湖附近的积庆山上，这一建筑依山傍水，极尽豪华，三年始成。为此民怨沸腾，权左司郎中高斯得曾劝止修造寺观，竟被宰相谢方叔罢了官。不久，理宗又敕令建造佑圣观、梅堂等，由其心腹董宋臣总负其责。董宋臣乘机强占民田，索贿受贿，搜刮百姓，是个祸国殃民、无恶不作的宦官。

天祥所谓的“献助”，即今之赞助之意。南宋豪门巨室的“献助”之风颇盛，不过，他们不是赈济贫民，而是为皇帝奢侈腐化的生活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也是他们获得皇帝恩宠以求升迁的手段。南宋末期的献助，多是豪门大族为修建宫殿寺观，无偿提供建筑用地、建筑木材及一切修缮所需材料。天祥对此举之所以深恶痛绝，在于豪门巨室的财富无不是对庶民百姓的盘剥搜刮而来。他们的“献助”无疑是慷人民之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天祥提到的“和籴”是自北魏以来历代王朝推行的一种粮食政策，即官府每年根据民户土地多寡，强制征购粮食。征购的粮食由官府定的价格大大低于市价，实际上是剥削百姓的一种手段。和籴政策从表象上看貌似公平：富户征购得多，贫苦农民征购得少。即使吃国家的亏，大家也都是一样的。其实则不然，由于南宋政治倍加黑暗，社会风气极坏，富户为了少被征购或不被征购，他们纷纷向地方官送礼行贿，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贫苦农民。他们往往不堪盘剥和催逼，被迫流离失所，转死沟壑，所以天祥大声疾呼：“东南民力竭矣！”

至于贪官暴吏对人民的剥削和勒索，南宋同前朝相比则有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组成了一个庞大的

贪官暴吏群体。南宋是“取民益无纪极”的时代，朝廷每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对人民进行苛酷的剥削。夏秋两税，都较旧定额数增加了五至七倍。北宋时期，赋税收入最高额为每年六千万贯，而南宋时期，其统治区域少了三分之一强，但赋税收入最高额却增加到八千万贯。

权臣贾似道，不仅是个丧权辱国的卖国贼，而且，也是个阴险毒辣的贪官暴吏。他曾令人贩盐百艘至临安，从中牟取暴利，中饱私囊。而且，“人有珍异，不能得，则以事罪之。”<sup>①</sup>一个叫刘振孙的朝官，因有玉钩桶没进献给他，竟被罗织罪名罢官归里。其贪婪之心，甚至对死人也不放过。他听说余玠死后有玉带殉葬，于是“发冢取之”。贾似道不只贪财，而且“视吾民为家鸡圈豕，唯所咀啖”。一天风和日丽，他在一群姬妾陪伴下，倚楼观赏西湖美景，这时，有两个青年道士手持羽扇登岸而来，一姬道：

“美哉！二少年。”贾似道顿时醋意大发，变了脸色，但又假惺惺地说：“汝果欲从，当令其送聘礼来！”此姬尴尬地笑了。过了几天，他将姬妾们招到身边，手持一个木盒，说道：“此乃两位道士所送聘礼也。”大家既兴奋又怀疑，纷纷围拢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木盒。可是，一打开木盒，大家都惊呆了，原来是那个美女的头。诸姬妾吓得浑身战栗。

南宋末年，吏治腐败，政治黑暗，像贾似道这样的贪官暴吏比比皆是，惟其如此，天祥才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来。

二、关于“人才之乏”的问题。天祥认为，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败坏。他说：现在的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自幼讲授章句，选择不背时尚，不迁逆长官的文章熟读，只要书读得多，字写得好，就认为有学问，并以此为资本，通过科举猎取功

<sup>①</sup> 《宋人轶事彙编》卷十八。

名利禄。归根结蒂,父兄所教,师友所授,只有一个字:利!而当今学子卓然自拔于流俗者为数不多。许多人在做官之前,心术已经不正,做官之后,他会不会是个有气节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员,则可想而知了。因此,依此道而得官位者,“竟奔于世要之路者”不足为怪;“趋附于权贵之门者”不足为怪;“牛维马繫,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更是不足为怪。

天祥认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而“士风一淳,人才或于是而言可得矣。”那么如何改变“士习”呢?他认为:首先,在家庭教育中,不仅要勉励子弟读书,还要学以致用,以圣人之道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其次,他建议高等学府即国子监的生员,既要读经,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论,同时,还要学习治理国家的实际本领,使学子摆脱读死书、尚空谈、图虚名的羁绊,而做一个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人。

三、关于兵力与国计问题。天祥认为:兵力与国计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后者制约前者。宋蒙交战之后,战线拉得很长,之所以顾此失彼,不能全线固守,表面上看似是由于兵力不足,其实不然。在天祥看来,根本原因是财政支出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朝廷没有制定保证军需的切实可行的政策。财政支出偏离了正确方向。国家大量金钱被皇室、大臣和寺观恣意挥霍,诸如:宫廷“靡金饰翠”,皇帝对贵戚近侍“量珠擎玉”,慷慨赏赐,以及修建“琳宫梵宇”等,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开销,国库的沉重负担。钱花在这里,养兵的费用还能有多少呢?天祥严正指出:“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则财未有不足者。”

四、关于虏寇与“盗贼”问题。天祥说:“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在他看来,蒙古的南侵,不是不可战胜的,而“盗贼”(指农民起义军)起于通虏寇,则心腹之大患也。”就是说,南宋王朝的心腹大患是农民起义军和虏寇的联合。这种观点

无疑是错误的。天祥似乎只是看到农民起义军与女贞、蒙古斗争对象的一致性，即都是南宋政权。但他忽视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差异性。农民起义是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女贞和蒙古贵族集团的南进，则是为了征服汉族，以扩大其统治范围，增强其统治实力。事实上两者没有联合，也是不可能联合的。因为“华夷之辨”是中国早就形成的民族共识，即使普普通通的农民，也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不会奋力推翻本民族的王朝统治，而去拱手接受异族统治者奴役的。所以，历史上并无二者联合的先例。天祥同岳飞等民族英雄一样，他们在抵御异族入侵的斗争中，为本民族也为他们个人的一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一遇“盗贼”作乱，每每留下不光彩的败笔。这只能归咎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宜苛责个人。

此外，在天祥的“御试策”中，我们不难发现，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他坦率、刚直的性格特征。考题中明确提出要求：“勿激勿泛，乃副朕详延之意。”“勿泛”即论述不要流于空泛，要言之有物，天祥对此并无异议。他说：“夫泛，固不切矣。”但“勿激”，即观点不可偏激，言词不要激烈，天祥对此颇不赞同。他认为：学子们的“激”是有原因的。他们长期生活在各个阶层之中，看到、听到或感受到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的腐败、民生的疾苦，他们为此而焦虑而担忧。他们也有许多可取的治国方策渴望得到朝廷采纳，却长期蓄积于心中，没有机会到天子之庭直陈己见。今天参加“御试策”，“得以借玉阶方寸之地”，“披露肝胆”，即使有些“激”也是无可厚非的。这正是臣下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表现了学子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反问道：“陛下岂厌激切正道之辞而喜闻阿谀唯诺之言乎？”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他的诗文中常用的“肮脏”一词。“我生独肮脏”、“学极支离，性惟肮脏”、“某肮脏一世之沉浮也。”肮